

● 喻权域

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

论「三个时间差」

——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



论“三个时间差”

——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

喻权域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年·沈阳

(辽)新登字1号 8181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喻权域著.

—2版.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10

ISBN7-205-02787-X

I. 论…

II. 喻…

III. 社会主义模式—中国

IV. D61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frac{1}{32}$ 字数: 199,000 印张: 12 $\frac{1}{2}$ 插页: 4

印数: 5,001—15,0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2版 1995年10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 华玉洪 责任校对: 刘涛 安丽君

封面设计: 李飞 版式设计: 赵耀今

定价: 13.00元

序 言

郭鼎

1991 年秋，喻权域同志《论三个时间差》一文，以其新颖的命题，引起我的注意。我读后，深感这是一篇富有时代感，针对性很强的政论文章。作为政论文章却没有一些政论文章中常见的“八股”调和“说教”的色彩，文章如行云流水，读后颇有新鲜感。作者以其独特的风格，丰富的国际知识和民主平等的精神，有理有据地与两代人平心静气地谈论社会主义兴衰问题，感染力强，效果好。我为在当今中国思想理论界、舆论界有此类文章问世，感到高兴。因此在当时，我曾向辽宁省委推荐，广为印发，组织党员干部阅读。现在，我又读到作者在原文基础上，扩充展开写成的这一本书，内容更加丰富，说理更加充分。相信其社会效果更好。

这篇文章问世，使我联想到邓小平同志在 15 年

前讲的一段话：“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我已经说过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教育全国人民、全国青年、全国工人、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也才能够说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我提议中央宣传部把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并且提议，对于确实写得好的著作，经过评审，应该由党和国家发给奖金，以便给这项看来似乎平凡实则很艰苦的工作以应有的荣誉。”（《邓小平文选》）（1975年—1982年）第166页。）

引文太长，是作短文的一个“大忌”，但是我不惜犯“忌”，就是因为这段话放在现在这个场合十分适合，不引全则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想。这本书无论就其内容或语言来说，都体现了小平同志提出的“崇高的

创造性的科学工作”，“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要求，是值得称赞的。它为当今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架起了一座桥梁，是值得两代人一读的。它对于“那些向今天的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来说更是值得一读的。我相信人们读后，一定会得到启迪和鼓舞。

读了喻权域同志这本书使我们不难体会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科学理论，而这正是作者写作此文的指导思想。作者力图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一真理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全书所表达的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坚定信念。改革开放的15年，是中国大发展的15年，这15年发展的道路的本质，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但是，对于这一本质，现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得很清楚的。

譬如说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谈话中讲了五句话：“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五句话本来是完整统一不能分割的，可是现在有的同志只是突出地强调“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后面三句话被略去了。此种说法即或出发点

是好的，也是偏颇的。完全消灭剥削固然是将来的事，但若不消灭剥削，不消除两极分化，能达到共同富裕吗？没有共同富裕还算什么社会主义。

又如小平同志在谈到社会主义本质时，没有讲“公有制”这个词，其实在五句话中已有此内涵。近来有些人讲：公有制对于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手段，而且这种手段可用可不用，也可以用其他手段如私有制来代替。这种说法是同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相违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声明的一个根本原则，怎么能从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引出取消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论断来呢？没有公有制或公有制不占主体的社会，能叫社会主义社会吗？如果说公有制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那么请问哪种所有制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呢？喻权域这本书，以大量无可辩驳的数据，证明公有制占主体的苏联和中国，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大大超过私有制的美、英等国。即使在今天，我国公有制企业的经济效益（投入产出比），对社会的贡献，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对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贡献，也大大高于非公有制企业，我们为什么要抛弃这个“手段”呢？东欧和独联体各国抛弃公有制推行私有化，带来的经济灾难，难道我们还要重复吗？我们已

往出现“左”的错误，不在于坚持公有制而在于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去“急于求纯”，超前地要求“一大二公”，把公有制绝对化，搞过了头。因而在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具体实现形式等方面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就需要改革。改革，又被称为“第二次革命”，其目的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最终发展过渡到共产主义。改革不是要抛弃公有制，抛弃社会主义，抛弃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抛弃了就会给国家民族带来大灾难。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常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如果不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不进一步调整改善所有制结构包括适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不积极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经济，不积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那么，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也是一句空话。这也是一个起码的常识。离开这些最起码的常识去认识和处理问题，就难免走偏方向。

这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雄辩的事实、数据，对当代国际国内时事、政治、经济等问题，进行辩证的分析比较，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从而得出结论：在历史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未失败，在当代，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蓬勃发展，正在日益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前途无量！使我们充满信心。

以上这些，与其说是这本书的序言，莫如说是本书的读后感。由感所发，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自序

喻权域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我国许多家庭的晚餐桌上，两代人经常发生争论。争论的是一个题目：中国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是应该改而走资本主义道路？

1991 年春末，来自辽宁的一份材料，使我感触很深。

那年春天，辽宁某大企业的一位工程师有一件大喜事，却带来一场大烦恼。那位工程师的儿子从外地大学毕业，有了顺心的工作，结了婚，带着新媳妇回家看望父母。工程师很高兴，备上酒菜，款待儿子、儿媳。席间，儿子大发议论，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失败了，中国不应该再搞社会主义，而应该实行“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即政治上取消共产党领导，经济上推行私有化，搞资本主义。工程师与儿子辩论，但说不过他，气得掀桌子，把酒菜撒了一地。过了几天，工程师想，掀桌子毕竟不能解决思想

问题，于是又办了一桌酒菜，把儿子的叔叔、舅舅、堂兄妹、表兄妹请来，一同与儿子辩论。可是，搬来的援兵分成了两派，其中一些人支持他儿子。工程师气得不得了，由于面前有客人，不能再掀桌子，他只好拂袖而去，回到自己屋里生闷气。事后，他苦恼地对党委书记说：“我绝不能容忍我的儿子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可是我辩不过他呀！”

我认为，那位工程师颇有代表性。在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很多的，他们大都是“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们从中国百年的屈辱历史和自己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但是，面对新的、复杂的世界形势，他们难以作出解释；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挑战，他们苦于讲不出多少道理来反驳。尤其缺少“新招术”，无法说服那些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很深的年轻人。

提供思想和理论武器的工作，本来应当由理论干部队伍来做，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某些领导同志对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采取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态度。他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进攻节节退让，采取“宽容政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工作者却不时进行责难甚

至打击；更没有认真组织力量系统地研究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并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与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单位的许多思想政治工作者，对于尖锐的问题和挑战只能回避，或者说一些“老话”。很多“老话”是真理，但“老话”毕竟难以解决新的思想问题。

人们常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被当作真理。那么，真理重复一千遍呢？我想，如果不能经常拿出新的解释和说明，把真理（结论）简单地重复一千遍，会令人生厌，甚至会被人看成谬误。

我算不上理论家，只是喜欢对国内外各种现实问题作理论思考，还喜欢与年轻的知识分子交往，与他们一起探讨。我这些年轻朋友的工作单位不同，所学专业不同，思想政治观点也是各种各样的。我打心眼里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他们也信任我，知道在我面前坦陈己见、互相争论无须顾虑。他们每天有较多的时间读书，接触到的新论点和思想问题也比我多，我经常从他们那里吸取知识。他们提出或反映的尖锐问题，促使我思索。我能回答的就回答，不能回答的就研究，或者与他们共同探讨。我和他们是平等的，如果我听到逆耳的尖锐问题就摆出长辈或老师的架势来训他们，他们就不会向我说真心话，甚至再也不上

门了。在讨论、争辩和思想碰撞中，我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新思路。

1991年春天，读到辽宁那个材料后，我把自己的看法整理出来，在我所在的单位向年轻同志讲过两次，效果甚好。许多同志补充了新材料，提供了新论点，提出了新问题。五月，山东兖州煤矿设计院的同志来找我，说他们那里的工程师们也碰到辽宁那位工程师所碰到的同类问题，请我去讲一讲。我去后，分别与中老年和青年工程师们进行了座谈，听取意见，然后在大会上讲了三个多小时。其后又在兖州矿务局向千余名职工讲了一次。据说，听讲的中老年和青年的反应都较好，这给我打了气，鼓了劲。

从兖州回来后，我把讲稿整理成文章《论“三个时间差”——与工程师谈社会主义》。草稿排出小样，我按老习惯，分送给我的年轻朋友们提意见。他们“原则同意”我的文章，同时作了大量修改，补充了大量材料和论点。我择其善者而从之，经过整理，定了稿，先在人民日报内部刊物上登出，听听反应。

这篇2.5万字的文章刊出后，反应出乎意外，几个月间，海内外有24家报刊转载，各省市、各部门、各军兵种自行翻印的更多。接着便是大批读者来信。

第一批读者来信，多是老同志写的，他们家里也经常发生两代人的争论，气得他们“鼓鼓的”。得到我的文章后，他们非常高兴，赶快拿去给儿女看，据说相当有效。有的离退休同志视力衰退，他们互相邀约，集体念这篇文章，一起讨论，然后复印分送子侄。《中国教育报》收到的一封信非常感人，值得全文录出。

《中国教育报》编辑同志：

我认真地读了贵报的《论三个“时间差”》一文，真的像你们在按语中所说，写的极好，是对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

我也是个工程师，有一个公费留学不归的儿子，今年我有机会去美国看了他一次。原来我只认为他的思想有问题，结果发现他不是一般的思想问题，而是相当反动（只好用这个词了）。他说得中国一无是处。对祖国的一切，他没有不反对的。我教育他，他说我“强词夺理”。对政治、经济理论，他根本不懂，我只好讲实际的。我问他，西方有没有国营经济？他无法回答。我问他：“印度和中国比，哪一个先进，哪一个好？”他才真是“强词夺理”，说是“不能比，印度有民族问题”。我说：“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你知道吗？为什么中国不闹民族问题？”他只好支吾了。

他说我写给他的支持政府“六·四平暴”的信遭到他的同学（中国留学生）的嘲笑，埋怨我不该写那样的信。我说：“我不支持我们的政府，难道要我支持那些搞动乱、暴乱的人吗？动乱会有什么结果，东欧的事实不是很清楚吗？”他听不进我的话，最后我骂了他：“你吃了几天洋面包、喝了几天洋牛奶，就骂起我来了，骂起你的祖国来啦，你算什么英雄！”我说：“你们读了几本洋书，懂得什么！”我骂了他，并没解决他的思想问题，气得我回了国。

为了搞好对青年的教育，我建议：

一、组织些论述自由、民主、多党制方面的文章（过去这类文章讲理论多，讲实际的少），以教育广大青少年。

二、将《论三个“时间差”》一文印单行本（印刷质量好一点），发行全国，让家长寄送给在国外的子女，以教育他们早日回国，同时也让青少年很好地学习、思考。我至少买5本。送给亲友的大学生子女，让他们仔细读读。好好思考。

敬礼

一读者

这是一封“匿名信”，信封上的“地址”栏里，只

写了“云南”二字。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我国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多么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多么疼爱儿女。他恨儿子倒向西方，骂儿子“相当反动”。但是骂归骂，爱归爱，他尽力保护儿子的名声，希望儿子走回正途，所以他在信上不署姓名，也不写明地址。

我原以为只会收到中老年同志的这类信件，没有想到，第二次“来信潮”是青年同志写的居多。《中国教育报》用了两版篇幅刊登这些来信。他们热情洋溢地谈感想、发议论、讲决心——决心要利用好“第三个时间差”，使中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有的信上说：“如果我在1989年前读到这篇文章，我决不会去参加游行、绝食。”在美国波士顿留学的我国访问学者胡成来信说，他把《论三个“时间差”》一文复印了一些，“很快在朋友中流传开来，大家都认为有说服力，很解气”。他写道：“正是资本主义发生了问题，才产生了社会主义；如果资本主义完美无缺，社会主义就不会产生了。这本是一个历史和政治常识问题，这几年却搞糊涂了，搞颠倒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问题。人碰了钉子就想开倒车，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问题在于，开倒车就能解决问题吗？不能。苏联、东欧就是一例。”这些信件使我受到更大鼓舞。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一再说：党对青年一代充分信任，相

信青年一代能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胜利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振兴中华的任务。中央的估计是正确的，年轻同志虽然有生活经历少的弱点，但我国青年是有理智有头脑的，只要讲得有理，他们会明辨是非。一旦明辨是非，他们会焕发出很大的活力，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进行到底。

另有一事也出乎意外。我原以为会收到很多责骂我的信，我早就作好了挨骂的思想准备。然而，收到的几百封信中，只有一封信讥笑我“把文章写这么长，大概想多得稿费”。其他的信都是鼓励和肯定的，许多来信认为那篇2.5万字的文章太短了，很多问题没有展开讲，希望我扩充为一本书。我自己也觉得那篇两三万字的文章未能畅所欲言，许多资料没有用上，许多论点没有展开。因此，出版社的编辑约我写成书，我很快就答应了。可是，由于工作太忙，冗事太多，迟迟不能交卷。

1992年4月底，我收到辽宁抚顺钢铁公司一位姓童的读者（姑且隐其名）汇来的50元钱和他写的近6000字的长信。这封信的热情和坦诚，令人惊叹。我这里摘录其一小部分，给大家看看。

尊敬的喻公：

您好！我是辽宁抚顺钢铁公司的一名小知识